



任继愈文集 9

任继愈 著



任继愈 著
本书编委会 编

任继愈文集

9

緒論

理學之源。理學者，宋明

探究理學之源。理學者，宋明

理學之遠源本於洙泗，久成定

餘事間，其全部思想及問題進展

但詳人之所見，異人之所詳。疑似之

說，概所不取。為明立論宗旨，更闡五義。一曰自主

二曰祛惑，三曰辨析異同，四曰明字要，五曰進

序。

一曰自主。哲學思想即古人所謂道，所謂理。惟

目 录

史学研究

· 通 论 ·

关于中国封建主义的问题	1
漫谈封建主义与社会主义	14
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22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中国国情	37
中国文化的特点	44
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特点	47
清除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	55
爱国主义与历史责任感	58
前车之鉴与前鉴之蔽	61
中华民族的生命力	64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汇典》读后	68
历史的使命与政治的变革	72
原《中华文化》发刊词	80
寻文化之根	84

寻 根

——族姓之根与文化之根	87
生生不息 其命维新	92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95
发扬传统道德的途径在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	99
谈继承中国传统道德问题	103
为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创造条件	
——《中国文化大典》序言	108
科教兴国 千年大计	110
中国传统文化的光明前景	112
认识封建社会的农民	114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119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经验	122
· 古代史论 ·	
女皇的苦闷	146
中国古代宰相的职能	150
中国古代的宦官与君主专制	156
曹参、班超离任时对继任者的嘱托	160
论韩愈的历史地位	
——陈著《韩愈诗文系年》序	163
武圣孙武	172
中华民族的青年时代	176
齐文化的产生和研究齐文化的意义	179
论钱大昕	184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不可分	185
颇见史识 要言不繁	190

在《清史》编纂座谈会上的讲话	191
洛阳龙门石窟	
——中华文化的里程碑	194
历史长河中的“乱世”	195
《十六国帝王列传》序	198
论诸葛亮	201
· 近现代史论 ·	
五四精神	211
从《青春之歌》回忆当年	214
马一浮论蒋介石	219
实现中华民族历史使命的巨人——毛泽东	222
新旧交替之际	225
小掌故	230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233
高举爱国主义大旗 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纪念五四运动 80 周年	238
比前一个千年大不相同	244
新霸权主义	246
史学家的品格	250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254
社会科学没有“纯学术”	256
编修民国史的珍贵史料	261
· 专 论 ·	
忆毛主席谈古为今用	263
人人有保护文物的责任	267

坚持唯物史观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责	269
人才问题杂议	273
地区文化必须研究	285
民族文化的生命在于吸收、借鉴和改造	289
文化遗产的寿命	291
繁体字问题	296
《平原县志》序	300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总序	302
重读《天演论》	306
《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序	310
从“书同文”到“语同音”	315
汉字书法的演变与瞻望	318
八股文与八股文风评议	329
治史与忧国	333
《中国藏书楼》序	336
《中国历史知识三字经》序言	340
今天看孝道	343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总序	346
防患于未然	349
汉学发展前途无限	352
国内有法 国际无法	354
《齐鲁人杰丛书》序	358
《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前言	361
书法与物质条件	363
坚持科学发展观,推动文化建设与发展	370
汉字为中华民族立了大功	372
汉字识繁用简的必要与可能	375

“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贺辞	379
《周炳琳文集》序	381

· 通 论 ·

关于中国封建主义的问题^{*}

从战国到鸦片战争两千多年,中国是封建社会。与欧洲的封建社会相比较,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这么长呢?这个问题牵扯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构成因素,但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原因,封建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

封建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它的经济体系以家庭为单位,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是它基本的生产方式,也是生活方式。产品自己消费,吃、穿、用基本上自给自足。中国历史上,凡是天下比较太平,人民日子比较安宁的时候,往往是小农经济得到发展的时候。秦朝经过商鞅变法后,鼓励小家庭,儿子长大必须分居。汉初、隋初、唐初都是贯彻这一种方式。一家一户便于国家直接控制有生产力的人服徭役、交地租。但是小农经济不能经久,过一段时期就会产生土地兼并、两极分化,并由此引起社会动乱。小农经济的特点是不能够大规模高速度地发展生产,产品基本上消费掉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中国由此进入半

^{*} 据《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系作者1980年9月18日在陕西省哲学学会上的讲话,原载《人文杂志》1980年第6期。

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封建的经济势力、政治势力、文化传统非常强大,资本主义势力十分薄弱。也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更多的封建主义、较少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历史残迹,不能不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个方面。“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正是这个封建历史残余势力的大暴露。

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并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在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后就心满意足了,对于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这不是哪一个人认识不足,而是我们整个民族、广大群众,包括我们党内干部都对封建主义势力之大认识不足。这样就导致了极其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落后于资本主义,当然更落后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史的规律表明:落后的自然经济必然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所代替,资本主义又必然为更先进的社会主义所代替。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包袱就背得很重,问题也就更为复杂。落后的封建经济有没有带来好处?也有。比如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采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它的根据就是旧中国封建经济和封建势力是独立的、分散的这么一个落后的状况。如果是一个现代化的、商品经济发达、交通设施完备的社会,我们就很难设想能通过这样的道路取得革命胜利。中国革命成功,沾了封建主义的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则吃了封建主义的亏。

我们是研究哲学史的,现在仅从这个侧面来考察一下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能够维持这么长。

封建社会是一个有机结构,有它的生长、发展、衰落和死亡的过程。汉唐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不仅在中国封建史上值得大书特书,在全世界比较起来也是先进的。唐以后

开始走下坡路,一直走到鸦片战争。秦汉以后中国就是在大一统局面下的封建制。这种全国大一统的局面,与欧洲诸侯小国分散割据的封建社会有很大区别。中国的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采取一系列措施,从政治制度、思想体系方面,来巩固封建体制,维系大一统的局面。

从历史上看,中国封建统治的不断增强是通过集中中央权力和加大皇权来实现的。汉初刘邦分封了一些子弟,分封后发现他们闹独立性,以后就停止了分封,直接由中央控制全国各地,把地方官的任免权都收归中央。皇权也是在不断加强,从汉到唐,中央的权力形式上集中到宰相,宰相的权力相当大。宋朝开始削弱了宰相的权力,加强了皇帝的权力。到了明清,封建的皇权制进一步加强,废除了宰相制,实行内阁制。内阁实际上是皇帝的一个秘书班子,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上。汉唐时君臣坐而论道,宰相还有个座位。宋朝开始,宰相没有座位了,只能站着和皇帝讨论问题。明清以后,连站着也不行了,只能跪着接受皇帝的指示。宋朝的军队经常打败仗,不是他的兵不勇敢、武器不行,而是中央政府怕地方有权,出兵打仗时皇帝把事先规定的阵图交给带兵的将领,必须照颁发的阵图行动,否则打胜了也没功。那时没有现代的交通和电讯设备,指挥系统离阵地几千里,而战事是千变万化的,如果将军连机变的特权都没有,怎么能打主动仗,怎么能不打败仗呢!后来岳飞之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皇帝逃难顾不上颁发阵图了,部队有了发挥主动权的机会。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依附于皇帝的宦官、宠臣就可以窃权、弄权。由于皇帝庸劣而无力运用这个过大的权力,于是出现了宦官专权的黑暗统治。

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各种思想体系,也与这个制度密切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比如为了给中央

集权的封建专制服务,宋元以后把《大学》这本书定为国家的教科书,这本书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封建社会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思想体系哲学化、理论化,向全国灌输。维护封建制度的“三纲”说,就是从伦理、道德方面来巩固封建制度的。先秦时期思想家如荀子和韩非已经提出了“三纲”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在那时只是一种主张,并没有一种有力的措施来保证它的实现。到汉朝,地主阶级利用它掌握的政权和行政手段来推行“三纲”准则,如提拔那些贯彻“三纲”准则彻底的人,给他官做,从一家一户到全国,都推行“家长制”,这就使得“三纲”思想的贯彻有了制度保证,比先秦时期空讲道理有效多了。

封建社会产生家长制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以男性为中心的家长,他有生产经验,而且他是这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他有绝对的经济支配权和发言权。所以说,家长制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产物。

封建社会的家长制是合法的,是被人所承认的,同时也是巩固封建秩序的一个力量。在一个家庭里边也需要这么一个家长。封建社会在“三纲”思想统治下,根本没有个人的自由,也就不会产生个人主义。一个人,他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也一定是国君的臣民。不管是做官的还是没有做官的普通老百姓,都是皇帝的“臣”;臣对君,民对君,都只能绝对服从,没有平等的关系。只有君选择臣、民的权利,而臣、民没有选择君的权利。春秋战国时候国家很多,这个国家的人可以跑到那个国家去,臣可以择君而仕,老百姓也可以从这国跑到那一国去。而在封建的大一统的国家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你走到天边也是皇帝的土地,跑不出去。所以臣对于君,只有绝对的义务,绝对的服从,君对于臣却没有任​​何的责任。父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也是这

样,只能服从而没有反抗的权利。臣民是属于君的,子女是属于父的,妇女比男子又多了一层束缚——夫权。这就是说,封建社会里没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君主既是人,又是神,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老百姓就不一样,他不是臣就是子,或者是妻,独立人格的人不存在。这样就形成了绝对服从关系,上下级的关系也就固定化了,僵化了。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还没有养成运用民主权利的习惯,也不善于区别封建社会的上下级关系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上下级关系,所以家长制与一言堂能够通行无阻,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

“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的产物,他们提出的“三忠于”“四无限”等,都是封建社会里臣对于君的那么一种关系。如果真的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有民主的权利,那么领导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群众,关系应该倒过来。“四人帮”却片面地要求下对于上绝对的忠,上对于下则不负任何责任,不受什么约束。由此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一下子跳到了社会主义的,这就不免把封建社会的很多东西不知不觉地带到社会主义来,当作社会主义的好东西,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很多麻烦。比如说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教育人民要安贫乐道,就是说它把贫困看成是很高的道德,而把富足视为使人道德败坏的东西,要人们安于贫困。有一个叫作颜回的,是孔子的大弟子,他没有著作留下来,他的言论也不多,可是他却成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教育学生的榜样。理由在哪里呢?向他学习什么呢?就在于他穷,他能心安理得地来受穷,不要改善他的经济生活——根据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这就是他的美德。试看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没有不把穷困当作敌人而当作美德的现象呢?我看是有的,前若干年不是一直在讲穷过渡吗!似乎穷了就好,富了就变修了!因而

一直在把青年、干部送到农村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好像城市这个花花世界是个罪恶的渊薮,只有农村才能培养完善的人格。其实,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里,工人阶级的城市,哪能是产生罪恶的地方?!《共产党宣言》里就说过,资本主义发展以后,把田园诗的情调破坏了。中国社会也有这种田园诗,歌颂自然的美;当然诗是美的一个方面,如果把这跟人的道德要求,跟人的生活改善的要求联系起来看的话,歌颂穷困,歌颂安于贫困,这只能是对封建社会的君主有利,因为安于穷困就不会造反、不提任何要求,所以这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统治人民制造出来的一种道德标准——以穷为荣,而不是以穷为耻。

再比如绝对服从,盲目崇拜,这也是中外封建社会共同尊奉的一种道德。像这些绝对地忠,绝对地服从,盲目崇拜,对现社会的人有没有影响呢?我看是有影响的。就拿中国来说,经过宋朝以后,为了巩固封建秩序,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就把经过宫廷政变取得政权视为大逆不道。比如曹操,在唐的时候还没有被看成为一个反面人物,杜甫送曹霸的诗就称道他是魏武的后代^①,可见唐时曹操还被看作好人。但经过宋以后的批判,曹操就被看成历史上的一个坏人了。“五四”时代,北京大学的标语中有一条是打倒曹汝霖,曹汝霖卖国是应该打倒的,但公布曹汝霖的罪状,说他是曹操的后代,这就不对了,它说明近代革命的舆论也不自觉地接受封建的标准。再如“文化大革命”里打派仗,用大字报攻击对方不怀好意,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犯了什么罪过呢?他就是篡夺了曹魏的政权。本来这是他们两家封建贵族的政权争夺,我们是革命群众,有什么必要站到曹家来声讨司马家呢?这是封建的影响不知不觉地深入人心的

^① 原诗有“将军魏武之子孙”。

结果。宋朝以后的改朝换代有好几次,但通过宫廷政变来篡夺政权的一个也没有。秦桧是个奸臣,虽然他权力很大,但也不敢篡位,不敢当曹操、司马昭。社会舆论已经造成对君绝对的忠,不能够有丝毫的怀疑,这正是用宣传、教育的方式,加强封建主义的教育,收到了效果。封建社会到了后期,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会逐渐出现新的生产方式来代替旧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关系可以冒出来;可是我们中国的资本主义老是成长不起来,即使有过几次出现了萌芽,却又被压下去。从思想史方面看,因为有一套思想体系,不让新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重本抑末,“本”是农业,即小农经济,“末”是工商业,被看作是起坏作用,要人为地加以抑制。我们背上的封建主义包袱太重,中毒也太深,钻进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就有意识地把封建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来宣传提倡,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加以批判和反对。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封建社会的影响认识不够,就容易上当。封建家长制的统治,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民主,没有平等讨论的权力,这在封建社会个体农民的家庭里,不但是允许的,也是需要的。可是我们往往把封建的一言堂,家长制统治,跟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混淆起来。再如,关心每一个人的物质利益,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则。但由于我们分不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善于区别它们的差别,曾一度大力批判物质刺激,反对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宣扬穷了是社会主义,富会出现修正主义。

再从经济生产方面来看,封建社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它的产品不是商品,不是为交换,它不存在成本的问题,也不搞成本核算,可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知不觉地也把不计成本,不要成本核算,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来坚持,使我们的经济建设

吃了大亏。封建社会是不计成本的,像秦始皇陵墓的成本该怎么算呢?几十万人拼死拼活干了若干年,它的成本就无法算,也不需要算。我们管理经济的人,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进行经营管理的那种训练,认为成本核算是资本主义的,不计成本是社会主义的;把封建社会的经营管理当作社会主义的经济原则去贯彻;这种教训是很深刻的。过去流行过一句话: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搞经济建设不算经济账,这本身就是很荒谬的逻辑。

再比如说就业问题,在封建社会不存在失业问题,当然也不存在就业问题,有一块土地就一切都有了。现在我们国家的人口每年要净增一千万。这一千万人,如果不给他们安排个适当的岗位,他们就要找别的出路,要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劳动力需要有工作做。当然对他们进行教育是要的,但是光教育不安排,不行,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在封建社会就不存在什么失业问题,这是社会进入资本主义以后才发生的问题。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隔着一个资本主义,如果不对它们加以清楚地区别,就很容易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东西来对待。过去大寨就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这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分不清,堵的可能是社会主义的路,迈的可能是资本主义的步,也可能是封建主义的步,这样就可能乱了套。所以对封建主义的影响,千万不能小视。

封建社会都是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家庭成员一天到晚在一起,家庭对每一个成员世界观的形成,对他们的思想影响,是起决定作用的。可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家庭结构就起了变化。我们的农村是集体所有制,家庭成员活动的范围就比封建社会广阔的多,绝不是家庭这个围墙所能限制得了

的。比如有一家有三个儿子,有的在工厂做工,有的在学校教书,有的在生产队劳动,他们的经济收入来源不一样,有的是靠工资,有的是靠工分吃饭,他们三个都是自食其力,不靠家长吃饭,这样,他们的世界观、思想的形成,就主要是来自社会,而不是主要来自家庭和长辈。这就是说,家长对其家庭成员的影响与以前不一样了,对他们的约束也不一样了。家庭结构变了,长辈的地位、他的发言权和作用也就有了变化。在封建社会里,长辈有财产支配权,子女对长辈要孝,有求于他嘛!讨父母喜欢是希望能分到一点遗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就不一样了,如欧、美,小孩到了十八岁就完全独立了,离开了家自己找工作。家庭的结构变了,家庭的形式也得有个变化。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家庭结构也在起着很深刻的变化。每个人的收入来源,生活资料的来源,不是从长辈那儿来的,这就是一个变化。所以我们要真正解决老年人的晚年问题,光靠宣传教育、法律,是不够的,还要有社会保险能够跟上去。如提倡只生一个子女,那么将来一对青年要养活四个老人,那怎么行呢?这就要求社会保险能跟上去。社会要看到并承认家庭的结构有了变化。可是过去我们对这个变化认识不足,比方说选拔人才方面,我们自己给自己划了许多框框,限制自己。如选拔干部,就把家庭出身看得非常重要。一个人各方面都不错,吸收他入党也够条件,就是他父亲有点问题,这就不行;要不就是他舅舅有点问题,那也不行;甚至追到他的祖父的家庭成分,本来可以使用、提拔的干部,就因为这些不敢使用和提拔。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是个德国犹太人,如果用我们的标准看,这样来历不明的一个外国人,社会关系这么复杂,要当一个相当于外交部部长的国务卿,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们用封建社会的标准来看新事物,远远落后于形势,就使应该使用的人被遗漏了,这是很大的浪费。埋没了人才,也害了社

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动的“血统论”之所以能够得逞,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承认“血统论”。要不是社会上有这样的基础,光靠几个人高唱“血统论”也推行不开,推行了,大家也不信。

封建社会把家庭单位看得很重要,是因为家庭既是个生产单位,也是生活单位和教育单位。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这样的,还用旧眼光旧标准来看待家庭就不对了。如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就因此造成了一些无端的株连,一个人被打成反革命,一家子就跟着都倒霉了。反过去,有些搞特权的少数人,他一个人上去了,就一家子也跟着上去了,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农村生产队选干部,也往往受一家一姓一族的影响,不能够选出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人来。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如果沾染上封建主义的流毒、家长制的流毒,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封建社会的学习是读经,学习方法是背书,对四书五经要读、要背、要体会它的意义,但不能发挥个人的观点。封建社会的八股考试,代圣贤立言,就是把圣贤的话拿来发挥发挥,注释注释,经书上讲的道理只能照办,不准怀疑。于是就造了一种八股。毛主席不是反对“党八股”嘛,旧八股要反对,新的“党八股”也要反对。就是说,对圣贤的话,有多少是可靠的,也要研究研究。其实,封建社会的进步思想家也反对那种八股式的文章,《红楼梦》的作者就通过林黛玉的口,反对考试,反对八股,攻击代圣贤立言。资本主义社会的学习方式,同封建社会相比就不大一样了,他们就敢于怀疑,哪怕是出自孔子之口,不对的也可以怀疑,不肯轻信四书五经上的话。比如“五四”时代,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胡适写过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就评价了圣贤,在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他的观点我们不是都同意的,但他当时的认识比封建学者的认识